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情境主义国际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Michel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 arts de faire

日常生活实践

1. 实践的艺术

[法] 米歇尔·德·塞托 著 方琳琳 黄春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情境主义国际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日常生活实践

1. 实践的艺术

[法] 米歇尔·德·塞托 著 方琳琳 黄春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常生活实践. 1, 实践的艺术 / (法) 塞托著; 方琳琳, 黄春柳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3571-2

I. ①日… II. ①塞… ②方… ③黄… III. ①日常生活社会学 IV. ①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7996 号

Michel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 1. Arts de faire

Copyright © 1990 by Editions Gallimard

Specializ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NJ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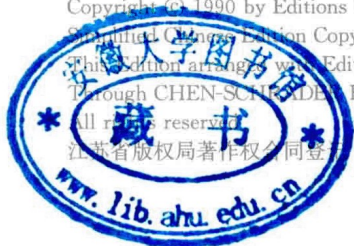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Through CHEN-SHEN-DE, Feng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

图字:10-2004-12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日常生活实践 1. 实践的艺术
著 者 [法]米歇尔·德·塞托
译 者 方琳琳 黄春柳
责任编辑 顾 涛 张 静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1.5 字数 303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2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3571-2
定 价 4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Michel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 arts de faire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成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目 录

1 / 研究的历史

实践的艺术

31 / 总引言

32 / 消费者的生产

38 / 实践者的战术

第一部分 一种非常普通的文化

53 / 第一章 一个共同的场所:日常语言

53 / “每个人”(Chacun)和“没有人”(Personne)

55 / 弗洛伊德与普通人

58 / 专家与哲学家

61 / 日常语言之维特根斯坦模型

65 / 现代历史真实性

70 / 第二章 大众文化

71 / 一门巴西的“艺术”

74 / 谚语陈述

78 / 逻辑:游戏、故事和言说的艺术

81 / 一个转变的实践:“假发”(la perruque)

89 / 第三章 实践:使用与战术

91 / 使用或消费

94 / 策略与战术

99 / 实践的修辞学,千年之计谋

第二部分 实践艺术的理论

109 / 第四章 福柯与布尔迪厄

109 / 散布的技术:福柯

114 / “博学的无知”:布尔迪厄

129 / 第五章 理论的艺术

130 / 切分与翻转:一种理论的方法

133 / “艺术”的人种学化

137 / 关于未知的叙述

141 / 思考的艺术:康德

149 / 第六章 故事的时间

150 / 言说的艺术

152 / 讲述招数:德蒂安

155 / 记忆的艺术与机遇

161 / 故事

第三部分 空间实践

167 / 第七章 行走于城市

170 / 从城市概念到城市化实施

173 / 失去的脚步一说

180 / 神秘主义:“使行走”之物

193 / 第八章 航海式与监狱式

197 / 第九章 空间叙述

199 / “空间”与“地点”

201 / 行程和地图

205 / 划界

212 / 犯罪?

第四部分 语言的使用

219 / 第十章 文字经济

222 / 书写:一种“现代”神话行为

227 / 铭刻在肉体上的法律

230 / 从一具肉体到另一具肉体

232 / 附身仪器

235 / 用于再现的机器装备

239 / “单身机器”

245 / 第十一章 声音的引用

248 / 移位的陈述

251 / 寓言的科学

254 / 身体的声响

258 / 第十二章 阅读:一种偷猎

259 / 关于书籍所提供“信息”的意识形态学

261 / 被埋没的活动:阅读

264 / 产自某一社会精英阶层的“字面”含义

266 / 这种“放肆的缺席”,是一种“分身练习”

268 / 游戏和诡计的空间

第五部分 相信的方式

- 277 / 第十三章 政治的可信性
279 / 信仰的贬值
280 / 一种考古学 信任的过渡
283 / 从“精神”权力到左翼反对党
285 / 关于真实的体制
288 / 被朗读的社会
- 292 / 第十四章 无法称呼之物:死亡
293 / 一种不可想象的实践
294 / 说,就是信
296 / 书写
298 / 治疗的力量及其复制品
300 / 可消失之物

不确定之物

- 306 / 层状地点
308 / 多变的时间
- 311 / 索引

研究的历史*

I

“只有在一个时代结束之后
人们才能够对使得这一时代
存在的事物加以陈述，
如同它只有在死亡之后
才能成为一本书。”

1980年2月,《日常生活实践》^①首次以袖珍集的形式面世。它介绍了一项经历了漫长时期(自1974年底至1978年)的研究成果。在此之前,这些成果中仅有一些零碎的片断得到过介绍^②。作为一部首次出版的研究著作,能够直接以袖珍本的形式面世在当时并不常见。一般而言,研究著作总是有待认可,它们通常以常规版本发表,但往往更多的却是在炼狱中消失,消失在政府部门或研究中心的秘密之中,被他们归为“灰色文学”。而这部著作自编订完成之日(1979年9月)起就受到了独特的礼遇,关于这些,我们可以从袖珍集的特征、主要作者的品格以及该智力项目的内在逻辑等方面来进行阐述。

* 与这部作品相关的注释收录在正文部分。用数字标出的注释列在每一册的卷末。(此为法文格式,中文版将以*引出的原文注释按照法文版格式收录在正文部分,而用数字标出的注释列在每个章的末尾。译者注也以*标示列在正文中。——译者)

II 在那些年代里,10—18开本的丛书并非普通的袖珍本。它有自己的特征、声誉、章程和宏伟目标。该丛书的主编,或者说是出版商,克里斯蒂昂·布尔若以简朴的形式大规模、低成本地出版了最新的社会和人文科学著作,并将它们与文学著作一起出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译著。因为布尔若相信文本形式的重要性,就如同他相信作者、体裁和风格的质量与多样性一样。在新兴的观点、抵触的概念和对敌对学派的斥责以及行业术语等嘈杂的纷争中,10—18开本的丛书促进了词语和观念的流通,顺应潮流地发行了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在这些作品中,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国人的躁怒(*la furia francese*)*来探讨西方的结构主义或种族中心主义。这位主编敏锐的嗅觉和好奇心以及当时有利的经济形势为这个理想主义的赌注赢得了时间。1968年之后的法国,经济繁荣,社会略有动荡,为了顺应经济现代化、城市化的潮流以及大学毕业生的大量增长而依赖于社会科学的效用。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带着对马克思、弗洛伊德或列维-斯特劳斯的热情撰写论文。他们或支持或反对阿尔蒂塞、乔姆斯基、福柯、拉康,争相购买他们的作品,阅读他们的追随者或反对者的论作,因为他们进入了理论之中,就像以前人们投身到宗教或革命中一样,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者”的厌倦,还是意识形态大厦的毁坏都没有影响到大量的作者和读者。唯有一些敏锐分子紧紧追随着这依稀可见的“断层”,在这“断层”处,“光辉年代”的宁静即将消失;他们

III 避开过于简单但仍然发挥效应的对立关系,努力以别样的方式来阐释社会。

米歇尔·德·塞托正是这些目光敏锐的反传统思想家中的一位。在知识舞台上,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从不遵守某一既定学科的教

* *La furia francese*, 意大利语,意为法国人的躁怒,17世纪欧洲流行语。——译者注

条,他的智慧光芒遵循与大学、教堂、国家等的所属机构的逻辑不相符的道路。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以关于神秘主义和16、17世纪宗教派别的学术性著作而受人敬仰,同时,他对默默控制着历史学家这一职业的认识论做出了苛刻而清晰的批评,为此塞托也深感担忧。人们责备他把真相的概念相对化,猜疑学术机构的客观性,强调等级关系中的依赖与默契的分量,甚至还责备他质疑公认的典范,正是他们为法国历史流派赢得了声望。不久,人们又抱怨他牺牲对“现实”(réel)的捕捉,将写作的角色置于首位,而历史学家却希望对“现实”进行“真正”的描绘。他会不会是对情境和文本的符号学或精神分析阅读太感兴趣了?这些都是被正确的历史方法排斥在外的,它们有损于建立档案、积累(不可能的)完整的文献资料这一(神圣的)理想的实现。反复的、不公的、恼人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责备,不过,对于他在研究工作中提出的任何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人们都无法证明是错误的。于是,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过于?)出色地重新审视了黎世留统治下的卢登事件,冲破了他的困惑和同行的愤怒:“在作为神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米歇尔·德·塞托看来,除了驱魔人自认为已经清理过了的地方之外,魔鬼无处不在。”塞托“懂得玩弄各类言论,依次运用各种语言。他时而是医学历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时而是神学家、精神分析学家、量化者、弗洛伊德或福柯的信徒”;“他从不放松警惕,总是令人难以辨认。通过介绍奇妙的《卢登的痴迷》**，米歇尔·德·塞托创作了那一年内最尖锐的作品。”③

IV

米歇尔·德·塞托对知识拥有广泛的兴趣,他交错运用各种方法,绝不局限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同时他又具备丰富的才能,令我们感到既惊奇又窘迫。对于自己的职业,塞托怀有持久的兴趣,然而在其职业棋盘上,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绝不让他人将自己限定在任何一个固

*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著名史学家,著有《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1975年出版。——译者注

** *La Possession de Loudun*,《卢登的痴迷》,米歇尔·德·塞托著。——译者注

定的棋格中。作为耶稣会会员，他拒绝了该隶属本可以为他提供的抚恤金，却又始终没有中断与耶稣会的联系。塞托从前只是一位历史学家，而后又成为了古典文化方面的大师，正如他将苏兰——这位神秘的17世纪耶稣会会员因“疯狂”而对一切抱有怀疑态度——的《书信集》重版这一举措所证明的那样，他不满足于在过去有限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显赫地位。他关注精神分析，是雅克·拉康的弗洛伊德学院的成员。自从1964年该学院成立直至1980年学院解散，他一直与拉康学派的诸多大贵族保持着学术友谊^④。不过，他同样关注语言学，从不间断地出入格雷马斯理论符号学研究班(巴黎)以及由皮诺·帕伊奥尼*精心组建的乌尔比诺年度会晤(意大利)。

V 1974年，一个研究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公共组织向他发出了邀请(关于这次邀请的具体情况，我过后再讲)，这主要归因于他学术活动的另一个方面。事实上，早在1968年，塞托的声望就已经超出了其研究所涉及的历史学家的领域，而达到了基督教的范围之外，耶稣会会员的身份将他纳入其中，但是他拒绝其限制自己的学术与社会交流。从此，塞托成为众多左派学术研究会的座上宾，政治决策者向他咨询，或者让他参与咨询，高层行政机构的智囊团也向他请教。于是，他以非正式的方式与以埃达尔·富尔为核心的智囊团(*brain-trust*)联系在一起，该智囊团在1968年夏天尝试改革大学并为筹备新学期开学创办了新的基金会。不久，人们建议塞托在这些地方教授历史和人类学：1968年至1971年，他任教于巴黎八大(万森)，随后在1971年至1978年，任教于巴黎七大(西尤)。

塞托对1968年5月至9月间发生的“事件”风暴——就如当时的人们所言——进行了活生生的剖析，其分析才能令人惊叹，而这个新的社会角色就源自此才能。他在耶稣会会员的月刊《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至今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章，其中关于这段变幻不定的时期，他赋予

* Pino Paioni, 乌尔比诺大学符号学和语言学国际中心教授。——译者注

了读者智慧而丰富的阅读,这一阅读富于变化,摆脱了试图麻痹诸多同时代人的担忧^⑤。塞托并不试图提出解决方案,也不尝试给出最终的判断,因为最终的判断会封闭未来,不过,他首先尽力去理解偶然发生的事情。他的对象不是每日的废弃物、政治话语的紊乱、人们的哀诉或责备,而是巨大的言语混乱中更加深刻,甚至更加神秘的本质。这种骚动、这种言辞和对垒的混乱,这种反抗和罢工,关于社会及其潜在的因素和希望,它们想要表达什么呢?在他认为早已察觉的言语与行动的断裂中^⑥,塞托没有看到任何威胁,却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面对不知道或者不能够承担父子关系的父辈们(塞托那一代人),他辨认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的开端,发现了子辈们合理的焦虑,无论是平凡的快乐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都无法缓解这种焦虑。

VI

1968年令塞托感到惊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受到感染”、“发生变化”。这件事情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是决定性的。按照他的另一个说法,即用来描述当代基督教处境的说法,对他而言,这简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断裂”^⑦,并非他希望放弃、忘记或否认自己先前的存在,而是因为从此以后,他的学识、智慧和社会能力都将以别样的方式调动起来,用于进行澄清化的努力,这一努力是最为迫切的。他说,从此他必须“重新回到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中,必须理解不可预见性传达给我们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即从此之后,我们将会变成什么”^⑧。对于这个任务,回避是不可能的:“使之清晰对我而言是必需的。这个必需并非首先对别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是由于真实性的需要。”^⑨他不知道怎样赋予这个根本的寻觅以真实性,他犹豫、摸索,寻找行动的空间、分析的工具和适当干预的方式。他思考学派、大学以及语言学少数派的问题,思索社会中构成文化的因素。他的思想试图找到自身的道路与目标,并且已经辨认出了其真正的问题:“冒失的问题:‘怎样自我创造?’”,这一问题替代了曾经“十分急迫的问题:‘创造什么,怎样创造?’”^⑩从这一问题中,我发现了《日常生活实践》的基础观点回归的首要形式,同时,我的关注点从被动的产品消费转移到源自产品实际使用

中的偏离的匿名创造。

VII 鉴于他在 1968 年以来的诸多研究中对原始地位的捕捉,人们建议塞托担任阿尔克-埃-色南国际讨论会(1972 年 4 月)的报告发言人。该讨论会必须为(同年 9 月)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共同体部长间会晤做准备,以便确定一项欧洲的文化政策。这项工作是塞托关于文化实践的思考结晶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1974 年,他以《多元文化素养》*为题^①,将为阿尔克-埃-色南国际讨论会编订的报告以及对相似对象进行的研究收录成册。权力机构希望以上层知识和公共利益为名使一致性占据统治地位,而他单独选定的这个题目则表明了对该一致性的拒绝。从这些收录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紧密地追随此项研究,而《日常生活实践》正是该研究的展开。正如塞托所言,其“理论任务”已经非常清晰:必须关注的是使用文化产品的运作,而非物质市场上提供的文化产品;是“通过某一实践活动将所接受的产品在使用中产生的偏离标志出来的不同方式”^②。重要的不再是,也不再可能是“学者的文化”,这一文化是在其所有者的虚荣中遗失了的宝藏。更不是“大众文化”,这是御用文人从外部赋予的名称,这些文人对权力机构已经清除了的内容进行着清点和美化。因为在他们以及权力机构看来,“死亡的美丽”因关进坟墓而愈加感人与闻名^③。那么,必须将注意力转向“易逝的”匿名创造的“迅速传播”,这些创造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同时它们也不会被资本化^④。在研究领域中,如果研究的理论方法仍然被错误地定义的话,那么研究的领域必然会受到限制。该领域包括“作为活动的文化运作”,它们的“轨迹并非不确定的而是毋庸置疑的”,为了赋予“文化运作”以清晰的地位^⑤,我们必须对它们的轨迹所构成的内容的形式与形态进行研究。关于这一点,《多元文化素养》所指出的就是这些了,至于日常实践中战术家的计谋所采取的迂回曲折的方式,有待以

VIII

* *La Culture au pluriel*, 《多元文化素养:大众文化研究与文化制度话语》,米歇尔·德·塞托著,李树芬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译者注

后的研究来加以阐述。

奥古斯丁·吉哈尔的友谊和赞赏为此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家文化秘书处学习与研究部门(曾经通用的行政划分)的负责人,吉哈尔对塞托早有耳闻,并阅读过他的作品。由于其所在部门负责指导此项研究,他首先在一年内巩固了与塞托的合作。此次经历更增添了他的信心,塞托是一个极具能耐的人。他有能力制定这项关于文化研究与行动的问题体系,而政治决策者及其政府都需要以此来引导他们的选择、终止预算方面的特权。吉哈尔利用恰当的时机娴熟且自信地向科学技术研究总委员会提出了建议^⑥。他在其指导委员会(由保罗·德卢弗里耶主持)占有一席之地,该委员会负责商讨“文化的发展”。1974年6月,第七计划的准备工作迫在眉睫,委员会却陷于困境,总是无法向总代表(于贝尔·居里安,国家科研中心的前任总主任,左派政府未来的研究部部长)提出非常清晰的构思。不过,还剩余一些可支配的研究经费,按照惯例,必须在预算部门冻结未花销的盈余之前迅速将它们投入使用。吉哈尔提出了一项关于智力范围的思考计划并粗略构思了一下,提议大家向米歇尔·德·塞托请教。他陈述理由、劝说大家,最终说服了大家,占据了优势。很快,一项“从社会展望学、具体案例以及研究领域中提取的综合分析”(委员会用语)便交由塞托负责。

IX

一份题为《形势、综合与社会展望学》的研究合同宣告了该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最初预计两年完成,后来延长了一年。这份合同实际上是从1974年底至1977年底,但研究的最终编订于1979年提交,因为塞托在1977年至1978年间任日内瓦大学特聘教授,随后,自1978年9月起他又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正式教授。塞托可以自由地确定合同的内容与方法,只需确保合同的科学方向并负责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合作者。他被要求负责社会展望学部分(专家政治论者就相信此类论述),另外有一位研究员也参与其中,但是后者很快就放弃了进展中的工作,因此塞托不得不决定组建一个文化社会展望学小组以如

期实现合同。“在科学形式下”，文化展望学被视作“乌托邦文学”（依据一份递交给科学技术研究总委员会的研究材料）^⑧。对“未来的介绍”以及“系统分析”的宏伟计划做批评阅读——人们认为这一阅读在对现状的描写中进行了整理并为预见未来赋予了可能性——显得令人失望，概念贫乏，数字重复与修辞过多，以至于口头上的研究无法进行。非常幸运的是，在此期间，风向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研究总委员会不再相信这些貌似喜人的泛泛之谈有多么重要。

X 按照合同的规定，塞托可以利用吉哈尔所在部门积累的文献资料和成果。该部门刚刚公布了一项广泛的有关文化实践的调查^⑨，此调查分年龄、性别、社会种类、居住地区等类别，为文化消费和娱乐活动的模式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数字化快镜。塞托本人则希望将他的计划与此类统计调查区分开来，因为他发现这类统计调查具有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甚至就根源于使用方法本身的特征。并非因为他轻视数字的作用，而是这种方式遮蔽了所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个人运作与使用、实践者不断变化的联系和轨迹。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引言中，他清晰地概括了对此的评论。统计“抓住了实践的材料而非形式；辨认出了使用的要素而非‘技巧’，归因于‘现用手头材料’（bricolage），归因于‘艺人的’创造性，归因于散漫性，这三者将原封不动‘接受’来的砖土色的部件结合在一起”；同样，“统计‘发现’的唯有一致性。它再现自己所属的系统。”

塞托的批判源自他对历史认识论的思考。在同代人中，他是少有的既热衷于新方法并准备为之献身，同时又熟知新方法的决断与限制的历史学家之一。面对美人鱼的歌声或信息化的现代主义诱惑，他决不屈服；或许正是对文本的热爱（以及阅读方式的多样化意识）使他免受同代人的影响。同样，他能够不屈服于相反的偏见，这些偏见机械地贬低了对数字、计算机、形式化的参考。我坚持认为，他的清醒源自其哲学素养和对认识论的兴趣。正因为此，塞托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数据资料的采集条件具有有效性和合理性之外，数据本身不具有任何